

詹安泰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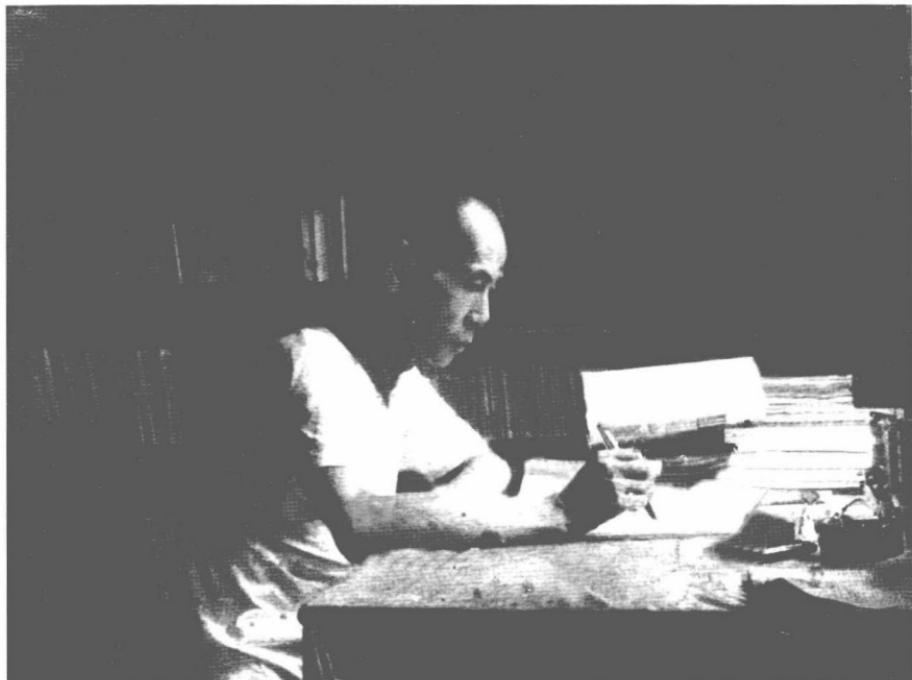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詹安泰全集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詹安泰先生在書齋中

出版說明

詹安泰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古典文學專家，在文學理論研究、古典文學作品鑒賞及詩詞創作等領域均有傑出成就，發表過許多部有關古典文學的專著和大量論文，在學界產生過重要影響，至今對於古典文學研究仍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由於出版時間久遠，原書流傳稀少，不易覓求，為滿足專業工作者和古典文學愛好者的需求，本社推出這部《詹安泰全集》。

《全集》收錄了詹先生現存的各類著述，包括其生前親自編訂出版及後人輯錄而成的專著六部，編者新輯散見於各種報刊、雜誌的論文五十餘篇，旁及友朋往來的信札等，並按文體分類編排，是迄今為止最為完備的詹安泰論著總集。

所收文稿，均依據最早或最可靠的版本整理校訂。由於各書內容體裁有別，體例未盡統一，為保留原著的面貌，除改正明顯的文字訛誤、引文差錯等，其他一般不作改動，對於一些不盡符合今日習慣用法的富有時代特色及作者語言風格的表述均予以保留。

本卷收入《屈原》、《宋詞研究》兩部專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一一年十月

目 錄

屈 原

一 偉大的愛國詩人	三
二 時代	一九
三 家世和出身	三〇
四 生平	四二
五 思想	六八
六 輝煌的藝術成就	八三
七 《九歌》	九九
八 《離騷》	一二〇
九 《天問》、《九章》及其他	一三九
十 崇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響	一七二
後記	一八一

宋詞研究

緒論	一八五
第一章 宋詞產生的社會基礎	一九四
第二章 宋詞的來源	二〇五
第三章 宋詞的作家作品	二六八
第四章 宋詞的基本內容	二九七
第五章 宋詞的藝術形式	三六七
第六章 風格、流派及其承傳關係	三九二
第七章 理論批評	四二九

屈

原

一 偉大的愛國詩人

屈原是我國兩千多年前一個偉大的愛國詩人，同時也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由於他把全生命的血液都傾瀉在他的詩篇裏，而他的詩篇還有不少被保存下來，因此，他作為我國古代一個最偉大的愛國詩人活在人們的心裏。

我們知道，愛國主義的精神，在我們優秀的古典文學遺產裏一直是貫串着的。在屈原以前的《詩經》裏面，就有不少具有愛國主義精神的作品，最突出的例子，是作於公元前七世紀的許穆夫人的《載馳》^(二)。許穆夫人為什麼要寫《載馳》這一詩篇呢？這故事是值得在這裏介紹一下的。原來許穆夫人的祖國是春秋時候的衛國，她是衛國領主衛懿公姬赤的女兒，嫁給許國的領主。衛懿公是一個奢侈淫樂的領主。他好鶴成癖，養了許多鶴。他把鶴和政府的官吏一律看待，給予一定的俸祿，套上華麗的衣服，出門還要用車子載它們。這種荒謬的舉動當然是要引起衛國人民的反對的。因此，當公元前六六〇年狄人攻衛的時候，久懷不滿的衛人都說：「你喜歡鶴，就叫鶴上前線作戰好了！」失了人民的支持，衛懿公戰敗被殺，衛國就被狄人佔領。許穆夫人向來是關心祖國的安危的，當衛國滅亡的時候，她

(二) 《左傳·閔公二年》：「許穆夫人賦《載馳》。」杜預注：「《載馳》，《詩·衛風》也。」今見《詩經·衛風》。本段解說，根據馮沅君《前七世紀的愛國女詩人——許穆夫人》，見《文藝報》第三卷第十期。

悲痛極了，就向當時第一個大國——齊國求援。齊國答允她，一方面派三千人去保護衛國的難民（當時都結集在衛國邊境一個叫漕的小地方——今河南滑縣白馬城——去逃避狄人），另一方面率領着一個諸侯羣打擊狄人，並且在楚邱（今河南滑縣東六十里）給衛國建造新城，恢復衛國。許穆夫人的詩，據說共有三篇，《載馳》以外，還有《泉水》（見《邶風》）和《竹竿》（見《衛風》），但標誌着她熱烈的感情和堅強的意志，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的作品，就只有《載馳》這一篇——共五章。像許穆夫人這樣出色的女詩人，在二千六百年前就出現在我們的祖國裏，這並不是偶然的事情，這是我們祖國的文化在當時已有相當高度發達的一種表徵。可是，在悠長的中國文學歷史上，把一生為完成祖國和人民交給他的歷史任務而奮鬥的過程，寫成了不朽的詩篇，作為偉大的愛國詩人出現的，屈原却是第一個。

屈原是戰國時代楚國貴族中一個最進步的分子，他熱愛祖國，關心人民，忠實於自己的正直的主張，以忘我的精神和一切惡勢力鬥爭到底，最後，他投入長沙東邊的汨羅江，以身殉國。相傳屈原是在舊曆五月初五日投江自殺的，廣大人民就在這一天以十分熱烈的心情用各種式樣來紀念他，最流行的是划龍船（競渡）⁽¹⁾和縛粽子。划龍船的意義，是要打撈他的屍首；縛粽子的意義，是要把粽子當祭品投入水裏給他吃。這種紀念的方式，一直流傳到現在。這說明了廣大人民對於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是多麼熱烈地愛戴！像這樣長久受廣大人民熱烈愛戴的詩人，不但在我們的國度裏不多，在全世界上也是一個很難得的人物。因此，在一九五三年屈原就成為世界和平理事會所決定紀念的世界四大文

(1) 詞宗懷《荆楚歲時記》：「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楫以拯之。」

化名人之一^(一)。現在，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都對我們祖國古代這位偉大的詩人有了進一步深刻的瞭解，這是多麼值得我們全國人民驕傲的事情！

屈原爲什麼會贏得廣大人民這麼熱烈的愛戴呢？這是與他對祖國的熱愛、對人民大衆生活的關心、對民間文藝的重視，以及他爲了祖國和人民的利益而犧牲了個人的利益、自始至終與國內的媚外集團和國外派進來的間諜作堅強不屈的鬥爭這種深厚的人民性和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分不開的。伯林斯基曾這樣說過：「愛自己的祖國，這就是說，要渴望祖國能成爲人類理想底體現，並盡自己的力量來促進這點。^(二)屈原的愛國主張，就正是當時人民理想的體現，他爲實現這理想而盡了一切的努力。列寧曾這樣說過：「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應該是出自廣大勞動羣衆的最底層。它應該是爲這些羣衆所瞭解和爲他們所摯愛的。它應該將這些羣衆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聯合起來，並把他們提高起來。它應該喚醒他們中間的藝術家和發展他們。^(三)屈原作品之所以有永久性，就正因爲他最愛好民間文藝，最善於吸取民間文藝，把民間文藝提高到文學史上很高的地位，同時，他又能够歌唱

(一) 一九五三年世界和平理事會號召全世界人民紀念世界四大文化名人，除我國的屈原外，是波蘭的天文學家哥白尼、法國的文學家拉伯雷、古巴的作家和民族運動領袖何塞·馬蒂。

(二) 見加里寧《論我國人民底道德面貌》，原載一九四五年《布爾什維克》雜誌第一期。中譯文載加里寧《共產主義教育》，時代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二二五頁。

(三) 蔡特金：《列寧回憶錄》，中譯文載《馬克思主義與文藝》，解放社版，第二〇六——二〇七頁。

出人民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並對他們起感染、鼓舞的作用。

由於屈原是歷來人民共同愛戴的人物，於是就產生了不少關於屈原的傳說：說他當楚國大飢荒的時候，在田裏號泣，淚落的地方，就產生了像玉粒般的白米；說他寫完了《山鬼》那篇歌辭的時候，周圍的山裏都有鬼叫的聲音，啾啾的鬼聲，十里外都聽得到，所有的草木都枯萎掉；說他在楚國的先王、先公的祠廟裏「呵壁問天」的時候，天慘地愁，白晝裏像黑夜一般，一連三天都是這樣⁽¹⁾。這是把他看成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了不起的人物了。還有一些傳說把他簡直看成是神仙中人：說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年間（公元二五年至五五年），長沙區回（一作「區曲」）忽然看見一個人，自稱是三閭大夫，對他這麼說：「聽說你要祭我，很好；可是往年祭我的東西，都給蛟龍吃掉了，現在如果要祭我，請把棟樹葉塞在上面，並用五色絲縛住，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蛟龍所忌憚的。」區回就照他的話做。後來縛粽子的風氣，就是這種做法的沿襲⁽²⁾。又說晉簡文帝（司馬昱）咸安年間（公元三七一年至三七二年），吳人顏璗坐船停泊在汨羅江邊，在一個月夜裏，聽見有人吟唱着：「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係屈原《哀郢》裏的句子。）顏璗覺得很奇怪，就前去問那唱詩的人說：「你是三閭大夫嗎？」那人忽然不見了⁽³⁾。像這樣的傳說，當然不是事實，是人民所創造，通過紀錄和口傳而流佈出來的。但從這裏

(1)

見沈亞之《屈原外傳》。

(2)

見吳均《續齊諧記》。

(3)

見沈亞之《屈原外傳》。

可以說明一個問題：人民總不願意他們所愛戴的人物活得太平凡，人民總不願意他們所愛戴的人物死去了就白白地化為糞土的。於是就給他創造出許多靈異的事迹，從靈異中表現他的突出；使他成為神仙，給他以持久的生命力，永生於天地間。傳說的本身雖不等於歷史的事實，然而它代表着人民對傳說中人物的看法和意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從愛戴屈原的心情出發的另一種表現，就是描繪、塑造他的形象，或者把他的作品作為描繪、塑造的題材。描繪、塑造他的形象的，如趙孟頫、張渥、顧洛的《屈原像》，陳洪綬、張若靄的《屈子行吟圖》，吳偉的《屈原問渡圖》、蕭雲從的《三閭大夫》、《卜居》、《漁父合圖》等。把他的作品作為繪描、塑造的題材的，如李公麟、趙孟頫、錢選、張渥、文徵明、仇英、陸治、陳洪綬的《九歌圖》，蕭雲從、門應兆的《離騷圖》（包括《九歌》、《天問》等）等^{〔二〕}。這些美術上的製作，雖然出自封建文人之手，甚至有的還是奉統治帝王的命令製作出來的（如門應兆的《離騷圖》），但既然把屈原及其作品作為製作的對象，就必然對屈原及其作品先有愛慕之心，同時也必然不能完全離開屈原這一人物性格去憑空結撰；在另一方面，由於這些在一定程度上更形象地體現着屈原的精神實質的美術製作的流行，因而也就加深了人民對於屈原這一偉大人物的愛念。其中最成功的作品如陳洪綬的《屈子行吟圖》，尤其深刻地體現着屈原的思想感情及其為祖國為人民的無比忠貞的偉大人格，因而直至今天尚為廣大人民所愛好，不少的民間藝人按照這一類型塑造屈原的肖像。

〔二〕 參看阿英《屈原及其詩篇在美術上的反映》，載《文藝報》一九五三年第十號。

此外，還有把屈原的故事寫成劇本的，最早的是睢景臣的《屈原投江》，可惜已經失傳。之後，像鄭瑜的《汨羅江》，尤侗的《讀離騷》，都或多或少體現着屈原的思想感情。至於像周文泉的《幼蘭佩》，敘述屈原投江爲仙人所救，赴趙國乞兵破秦，楚懷王回國，以屈原爲令尹，張儀、靳尚都得到應有的下場。這雖然不是當時的事實，而是出自文人的創造，但是已經能够把作者和廣大人民對屈原的同情和愛戴的心願深刻地體現出來了。

值得廣大人民愛戴的人物，他在當時的所作所爲，必然是和國家人民的利益大致相符合的。爲了實現有利於國家人民的主張而努力，即使は失敗犧牲了，人民對他還是同情的。否則，雖然在當時受到他的主子的愛寵，取得高官厚祿，但人民很快地就把他的名字從歷史上抹掉了，不抹掉，也只有讓他的臭名流傳下去，作爲激勵自己鬥爭情緒的一種醜惡形象。

在這裏，我想進一步考察一下屈原的主張是否符合於當時的國家人民的利益。屈原的主張，在內政上主要是變法，在外交上主要是抗秦。現在就從這兩方面來考察：舊貴族（暫用這名稱以區別於當時比較進步的貴族分子）的特權應該加以限制，分裂的局面應該統一，這就當時的歷史事實看，是人民大衆一致的要求和願望，屈原就正是一個主張變法——首先是限制舊貴族特權，主張統一天下的人。他在《惜往日》的詩篇中很明顯地說出他曾經和楚懷王密謀變法以及遭受讒人反對的經過。變法的具体內容，他自己雖沒有明白說出，其他的史籍也沒有詳細記載，據我的考察，是和他主張接受楚國先代的優秀傳統與外國的良好經驗分不開的（前者指楚悼王用吳起變法、楚威王好法制術數意圖變法事；後者指魏文侯用李悝、秦孝公用商鞅、韓昭侯用申不害事）。戰國時代的一般變法，都是爲了在一定程度

度上使生產關係適應新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先把國家內部整頓改革，朝向富強的路子走。在楚、秦兩國的先例，則是從限制舊貴族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所享有的特權入手。因為這種做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當時的生產關係從而逐漸解放生產力。就《史記·屈原賈生列傳》所載屈原制「憲令」遭受到舊貴族（上官大夫是舊貴族派系的人物）的強烈反對這一事件看來，屈原的主張，在從限制舊貴族特權入手這一點上，是和吳起、商鞅一樣的。這一點如果行得通，楚國人民當然可以得到好處。不過，屈原還有更符合於廣大人民的願望的更遠大的理想，他還要進一步完成統一天下的偉大事業。這理想也在他的偉大詩篇《離騷》裏充分表現出來。他所稱道的「前王」「前聖」如堯、舜、湯、禹都是前代的統一帝王，如摯、咎繇、傅說、呂望都是前代的「王佐」；如齊桓、寧戚，也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霸業的完成者及其輔佐者，威力所及，也不限於一個國家。因此，我們可以說，屈原主張的起點是變法，限制舊貴族的特權（當然，其中還要配合着正確的外交政策和良好的政治措施），而最終的目的是統一天下。這種主張，和當時人民大眾的要求和願望是一致的。從變法到統一天下，秦國的具體做法雖然不同，但它也還是朝着這個方向走。在當時，「橫則秦帝，縱則楚王」^{〔二〕}，秦楚一樣有統一六國的可能（楚國在當時無論人口、兵額和地域，都居七國中第一位，經濟力量也很充實），結果楚國滅亡、秦國統一了六國，其原因雖多，而秦的統治集團內部沒有多大的矛盾，和秦的君主能够把變法的主張貫徹到底，實為

主要原因之一。秦自孝公時任用商鞅變法，行之二十年左右，已打下了很堅實的基礎^(二)，後來舊貴族雖然感到不便，但他們已成強弩之末，不能發生什麼阻力，新興力量又逐漸成長，因之新法也就容易推行。楚國的實際情況就大大不同了。楚悼王用吳起變法，雖然在秦之先^(三)，但時期很短^(三)，基礎十分

(二) 《戰國策·秦策一》：「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孝公行之十八年。」《韓非子·和氏篇》：「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八年而薨。」(王先慎注：「疑『八』上奪『十』字。」)《史記·商君列傳》：「行之十年，秦民大說（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考《秦本紀》載孝公三年（公元前三五九年）用商鞅，行變法之令，二十四年（公元前三三八年）孝公卒云云，則實為二十一年，《國策》之說近是。

(三) 吳起變法在公元前三八二年（楚悼王二十年），商鞅開始變法在公元前三五九年（秦孝公三年），相距二十三年。

黃式三《周季編略》考定吳起入楚，在楚悼王十七年（公元前三八五年）。郭沫若《述吳起》說吳起入楚當在楚悼王十八年（見《青銅時代》）。考劉向《說苑·指武篇》：「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臼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又《韓非子·和氏篇》：「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滅（疑當作「纔滅」——裁減，形近而訛）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於楚。」則吳起入楚，先為苑守，問屈宜臼後再過一年，纔做令尹，實行變法時，已在楚悼王二十年（公元前三八二年），到第二年楚悼王死，吳起也就給貴族們射殺支解了（《史記·孫子吳起列傳》：「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戶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作射殺。《墨子·親士篇》：「吳起之裂其事也。」《韓非子·問田篇》：「吳起支解，商君車裂。」《淮南子·主術訓》：「吳起張儀『疑係「商鞅」之誤』，車裂支解。」《繆稱訓》：「吳起刻削而車裂。」《韓詩外傳》：「吳起削刑而車裂。」都作車裂枝解）。期間是很短的。

薄弱；楚威王有變法的意圖而見阻於昭釐〔二〕。到了楚懷王這一代，正應該急起直追，大力改革，因為這對楚國的興衰存亡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可是，這時舊貴族的勢力仍然很大，他們敵視屈原的主張，拼命攻擊屈原，楚懷王受了舊勢力的挾制、包圍，又不能始終信任屈原（當然，楚懷王的浮誇急躁、舉棋不定、徒具統一天下的野心而無實際辦法的主觀因素，也是不容否認的）；同時，秦國在楚國的間諜活動很厲害，除張儀與楚國的內奸像昭雎、靳尚等一向互相勾結之外，秦國還暗中派人到楚國做密探〔三〕。這就使得屈原的主張遭受到莫大的打擊而不能順利推行，其結果，不能不歸於失敗。但是事情很明白，失敗的原因，不在主張的本身，而在於一切的阻力。我們是不能因為他這主張由於舊貴族的反對，又由於舊貴族的反動力量的强大和外國間諜的陰謀而沒有實現，就否定這一主張——能使生產關係在一定程度上適應生產力的主張——本身的進步意義的。

〔二〕《呂氏春秋·去宥篇》：「荆（楚）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高誘注：制，術數也）。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注：中謝，官名也，佐王制法制也）。』王不說（悅），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從這裏可以看出楚威王是好法制術數的。法制術數是當時主張法治和變法的一貫的指標。

〔三〕《韓非子·內儲說下》：「秦侏儒善於荆（楚）王，而陰有（又）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秦）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